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学博士文库

郑炳林 樊锦诗 / 主编

唐代

敦煌汉文景教写经研究

王兰平 ◎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唐代

敦煌学博士文库

郑炳林 樊锦诗 / 主编

敦煌汉文景教写经研究

王兰平 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代敦煌汉文景教写经研究/王兰平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6. 7

(敦煌学文库/郑炳林主编)

ISBN 978 - 7 - 105 - 14447 - 1

I. ①唐… II. ①王… III. ①景教—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B9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86150 号

策划编辑: 虞 农

责任编辑: 张国兵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 编: 100013

网 址: <http://www.mzpub.com>

印 刷: 北京彩云龙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324 千字

印 张: 11.625

定 价: 32.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4447 - 1/B · 753(汉 263)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汉文编辑一室电话:010 - 64271909

发行部电话:010 - 6422478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兰州大学“985工程”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资助

敦煌学博士文库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敦煌研究院 编

主编 郑炳林 樊锦诗

编委 方广錩 邓文宽
张涌泉 罗世平
郑阿财 郑炳林
赵和平 郝春文
荣新江 樊锦诗

编务 冯培红 魏迎春

《敦煌学博士文库》缘起

郑炳林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作为 20 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之一在国际上引起巨大的轰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献主要部分流散到国外，分别收藏在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家，劫余部分收藏在原北京图书馆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等单位。由于敦煌文献收藏的国际性，因此敦煌学研究一出现就成为一门国际显学，一直领导着学术潮流。敦煌文献博大精深，敦煌石窟艺术内容丰富，作为敦煌学研究对象一直引起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而敦煌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人才培养问题，只有培养出一流的敦煌学研究人才，才能出产一流的研究成果。

敦煌学研究人才的培养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之初就引起老一代敦煌学家的关注。在季羨林、姜亮夫等先生的倡导下，1983 年在兰州大学、杭州大学连续举办了两届敦煌学讲习班，而后国家在兰州大学设立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其他高校利用其他专业设置敦煌学研究方向，培养敦煌学研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1998 年，国家考虑到敦煌学发展的需要，在兰州大学设立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这样敦煌学研究有了自己的专业齐全的人才培养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授权点是由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联合共建的国内唯一一个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双方很早就有良好的合作基础，1980 年，兰州大学聘请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敦煌学课程，1982 年起联合招收培养敦煌学硕士学位研究生。1998 年联合申报的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得到批准，形成

优势互补、珠联璧合。又于1999年联合建成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1999年，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招收的第一批博士生入校开始学习。为了培养高质量的敦煌学研究人才，并考虑到教学和研究单位的各自特点，因此在博士生导师的遴选上、博士研究生的管理培养上，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一套与其他专业不同的培养模式，实践证明这是本专业行之有效的最好的模式。敦煌研究院集中了一批石窟艺术研究专家，兰州大学在敦煌文献和敦煌区域史的研究上有很大优势，联合共建之后可以优势互补。为了将这一优势体现在敦煌学人才的培养上，使研究生在文献史地研究和佛教艺术研究上得到全面培养，敦煌学专业采取交互式的双导师制，这样既方便在校管理，同时也方便在敦煌石窟学习考察期间的指导，更便于博士生在以后的研究中充分利用敦煌石窟艺术资料。特别是在石窟艺术与敦煌文献的结合研究上，能够更大程度地发挥敦煌学专业博士生的培养优势。在敦煌学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我们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以体现联合共建这一地缘优势。第一是在博士生的培养上，敦煌石窟艺术与敦煌文献并重，教学与实际考察相结合，注意复合型研究人才的培养，将部分博士生的课程放到敦煌石窟中去教学，教学效果非常好；第二是博士生的研究及学位论文同导师承担的研究课题或项目结合起来，这样既便于博士生了解学术界研究动态并迅速进入学术研究的前沿，也利于提高他们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培养水平如何，主要依靠博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来体现。为了使博士毕业生的研究成果尽早与学术界见面，同时也使学术界对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培养的博士水平有一个全面了解，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敦煌研究院协商，各自拿出一部分经费，与民族出版社共同策划出版敦煌学博士文丛，挑选学术水准达到要求的敦煌学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出版，以利于这些博士们的成长。

敦煌学是兰州大学的重点学科，早在1979年就建立敦煌学研究

机构,1983年筹建敦煌专业资料室,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学辑刊》,建立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5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大学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1986年通过教育部申请到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资助。1998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成为甘肃省重点学科,1999年成为首批教育部敦煌学重点基地,2003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4年建成985敦煌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作为学科所在单位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并逐步发挥了优势。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通过四种渠道,广泛开展学术交流。第一,举办学术会议;第二,学术访问;第三,申请国外及其港台地区的各种基金项目,联合进行学术研究;第四,聘请国内外专家来研究所住所研究并开展学术交流。近年来,在这些方面都有很多作为和成绩。还将通过联合共建的形式,同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等机构(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拟筹建中国佛教艺术与文化国际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这样便于同国际接轨,提高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的培养水平。

要培养一流的敦煌学研究人才,就必须拥有一流的图书资料。在图书资料建设上,采取购买、复制与接受捐赠三种手段。经过近几年的重点建设,本专业图书资料有了很大的丰富,不但购买了齐全的敦煌学研究资料,如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永乐北藏、四库全书和续编等大型图书,及其近年或者以前国内出版的所有能购买到的敦煌学研究参考图书,还利用各种办法购置了最近台湾地区出版的敦煌学图书和日文版图书。在采购图书中,我们采取集中购买与零星购买相结合、个人购买与集体购买相结合等方法,力图在资料购置上做到齐全,为敦煌学专业培养一流的人才、出产标志性成果提供必要的研究条件。图书资料建设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

对外交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保证了敦煌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同时也为敦煌学界提供服务。还创建了敦煌学资料信息服务中心网站，在条件成熟后为整个学术界的研究提供网上信息服务。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还注意为国外培养敦煌学研究人才，招收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留学生，先后招收的留学生有读博和短期研修两种形式，主要来自于韩国国立首尔大学，中国台湾地区南华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九州大学、青山学院大学、成城大学、东北大学、东京艺术大学、东京女子艺术大学、龙谷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对留学生的授课与辅导，对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教学方法促进很大，目前留学生培养趋于成熟，教学和研修效果反映都非常好，并得到派出机构的称赞。

敦煌学专业的人才培养还体现在整体研究成果和研究方向上。敦煌学专业博士授权点承担有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际交流基金项目，特别是国际交流基金项目和博士生承担的基金项目增多是本学科的特色，有国际敦煌学项目、美国学术基金项目和日本和平基金项目。敦煌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传统与优势，除了对部分文书进行分类整理和专题研究外，还将对俄藏敦煌文献和法藏敦煌文献非佛经部分进行整理研究，并逐步开展对甘肃藏藏文文献的整理研究。第二，敦煌史地文献与中国西北区域史地研究是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多年来的研究重点，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工作，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第三，在石窟艺术和敦煌文献结合研究上，体现了我们的地缘优势。石窟艺术研究是敦煌研究院的优势，自1945年成立至今，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努力，完成了敦煌石窟的断代和壁画内容考释等大量的研究工作，代表敦煌佛教艺术研究的国际水平。联合共建之后，这一优势的研究成果及时体现在博士生的培养过程中。今后，我们还要扩大敦煌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领域，提高教学水平，培养出更多敦煌学复合型研究人才，成为国家敦煌人才的培养中心。

凡 例

(一) 本书所论之六件敦煌景教写经一律依据写经影印件按原有格式使用通行简体字释录，并加标点。为了便于读者核对写经录文与本书所附写经影印件，特别于每行录文前用阿拉伯数字标明行号。录文所见标号“〔一〕〔二〕〔三〕”等为校记或考释序号。本书因论述需要而征引之敦煌景教写经和其他敦煌文献录文则采用自然行释录。

(二) 录文均以写经影印件为据，适当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如已发表录文有误，则径行改正，并酌情出校。

(三) 写经影印件与参校本有出入，凡写经影印件文字文义可通者，均以影印件为准，而将参校本之异文附于校记，以备参考。若写经影印件有误，则保留原文，于错误文字后用（ ）注出正字；若写经影印件有脱文，可据他本或上下文义补足，将所补之字置于〔 〕内；改、补理由均见校记。

(四) 写经影印件因残缺造成缺字者，用□表示，不能确知缺几字者，上缺用 表示，中缺用 表示，下缺用 表示，一般占三格。

(五) 凡缺字可据他本或上下文义补足，将所补之字置于〔 〕内，并于校记中说明理由；写经影印件原文残损，但据残笔画或上下文可推知某字者，径补；无法拟补者，从缺字例；字迹清晰，但不识者于该字之后注（？），以示存疑；字迹模糊，无法辨识者，亦用□表示。

(六) 写经影印件原书者未书完或未书全者，用“(以下原缺文)”表示。

(七) 写经影印件所见俗体、异体字，凡可确定者，一律改作通行简体字；有些因特殊情况需保留者，用()将正字注于该字之后。

(八) 写经影印件所见笔误和笔画增减，径行改正；出入较大者保留，用()于该字之后注出正字，并于校记之中说明理由。

(九) 写经影印件所见同音假借字照录，但用()于该字之后注出本字。

(一〇) 写经影印件所见衍文，均保留原状，但于校记之中注明，并说明理由。

(一一) 本书收录与涉及之敦煌文献或文物，使用学界通用之缩写中外文词，即：

“S.”：伦敦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斯坦因(Stein)编号。

“P.”：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汉文写本伯希和(Pelliot)编号。

“P. t.”：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写本伯希和编号。

“Дх.”：圣彼得堡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编号。

“Ф.”：圣彼得堡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藏敦煌文献弗鲁格(Флуг)编号。

“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汉文写本北编号。

“北河”：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汉文写本千字文编号。

“B53: 14”：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出土文物编号。

“敦研”：敦煌研究院藏敦煌文献编号。

“甘博”：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文献编号。

“羽459”：[日]吉川忠夫编《敦煌秘笈》收录文献编号。

敦煌写本背面以“V”表示。

(一二) 为使本书行文简洁，所引用或参考之著作，首次一般均注明著者、书名、页码、出版社和出版年份，以后引用一般只注明著者、书名和页码。所引《圣经》（和合版）之章节，首次引用一般均注明汉英文名称，以后引用只列汉文名称。正文所涉及外国学者人名，首次一般均标明汉文译名和原名，并于人名前加注国名，以后出现只标明汉文译名。所引论著之作者不避名讳，一律以姓名称之，希望学界诸先生原谅。鉴于拙著所参考论著大部分均已正文标注，故书末不再列出参考文献目录。

目 录

凡 例	1
第一章 研究概况述评	1
第一节 疑伪唐代景教写经研究	5
第二节 唐代敦煌汉文景教写经之译释	12
第三节 唐代敦煌汉文景教写经思想内容研究	22
第四节 唐代景教文献与佛道文献之比较研究	26
第二章 敦煌古代景教遗迹及文献	31
第一节 敦煌景教“大秦寺”及其有关问题	32
第二节 敦煌出土基督宗教写经及其他有关文献	35
一、汉文写经	35
二、其他有关汉文文献	36
三、相关回鹘文文献	42
四、相关藏文文献	43
五、相关叙利亚文文献	45
第三节 敦煌古代基督宗教遗物	47
一、景教人物画像	47
二、景教铜十字架	50
三、敦煌《莫高窟六字真言碣》、《重修皇庆寺记》之 “教士”、“长老”题名	50

第三章 敦煌景教写经真伪辨	54
第一节 所谓李盛铎旧藏敦煌景教“小岛文书”	
二种辨伪补白	54
第二节 日本杏雨书屋藏富冈文书高楠文书非伪辨	57
一、问题之由来	57
二、叙汉译词辨析	64
三、“天尊”辨析	81
四、忠君孝道思想辨析	88
五、林文所举有关字形不能视作贗品之证据	93
六、非伪之证据——基于写本字形辨析	98
七、小结	121
第四章 序听迷诗所经	124
第一节 “十愿” 辨析	125
第二节 经文与《圣经》 比对	133
第三节 经文录文	141
第四节 经文录文之校记与考释	152
第五章 一神论	173
第一节 神学思想分析	174
一、论上帝之神力	175
二、论五荫及世界万物之构成	177
三、论魂魄	179
四、论神识	180
第二节 经文与《圣经》 比对	181
第三节 经文录文	191
第四节 经文录文之校记与考释	215
第六章 志玄安乐经	236
第一节 “十种观法” 辨析	237
第二节 经文录文	243
第三节 经文录文之校记与考释	254

第七章 大秦景教宣元本经	264
第一节 经文录文	265
第二节 经文录文之校记与考释	269
第八章 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	276
第一节 经文录文	278
第二节 经文录文之校记与考释	280
第九章 尊 经	285
第一节 经文录文	285
第二节 经文录文之校记与考释	289
第十章 结 语	293
附录一：唐代汉文景经影印件	299
一、高楠文书《序听迷诗所经》（羽 459）	301
二、富冈文书《一神论》（羽 460）	307
三、李盛铎旧藏《志玄安乐经》（羽 13）	322
四、李盛铎旧藏《大秦景教宣元本经》（羽 431）	328
五、洛阳景教经幢石刻本《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	329
六、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 (P. 3847)	330
七、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尊经》(P. 3847)	331
附录二：唐代景教研究论著目录续补	332
一、汉文论著目录	333
二、非汉文论著目录	348
后 记	355

第一章 研究概况述评

唐代景教研究自明季天启年间（1621—1627）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迄今已近四百年。20世纪初敦煌藏经洞开启，出洞遗物就有唐代景教文物，比如英国斯坦因（Aurel Stein）所获景教人物画像，法国伯希和（Paul Pelliot）所获 P. 3847《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李盛铎旧藏《志玄安乐经》（羽13）和《大秦景教宣元本经》（羽431）。此外尚有“高楠文书”《序听迷诗所经》（羽459）、“富冈文书”《一神论》（羽460），长期以来上述两件写本亦被视作出自藏经洞之唐代景教写经，但其真实性近十多年来受到林悟殊、荣新江等学者质疑，其真伪至今尚未定论。进入21世纪，2006年5月洛阳古玩市场（豫深文博城）发现唐代景教石经幢，经幢上刻有《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经文可与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大秦景教宣元本经》（羽431）互为校勘，证明两者系同一部景经。洛阳景教经幢作为唐代景教重要遗存，其一经

发现就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①在此推动下,洛阳又有景教遗物被发现和认定,比如2013年于龙门石窟西山红石沟北崖发现一处唐

① 相关公布和研究情况,参见张乃翥:《一件唐代景教石刻》,载《中国文物报》,2006年10月11日第7版;张乃翥:《跋河南洛阳新出土的一件唐代景教石刻》,载《西域研究》,2007(1);罗炤:《洛阳新出土〈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及幢记〉石幢的几个问题》,载《文物》,2007(6);罗炤:《再谈洛阳唐朝景教经幢的几个问题》,载《世界宗教研究》,2007(4);冯其庸:《洛阳惊现大秦景教碑》,载《中华遗产》,2007(10);徐涟:《景教石刻经幢现世 学术公案有望定论》,载《中国文化报》,2007年9月27日第1版;冯其庸:《〈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全经的现世及其他》,载《中国文化报》,2007年9月27日第5版,又载《中国宗教》,2007(11);何欢、刘云屏:《文化对话史的一大史证 新近发现的〈景教宣元至本经幢〉的价值》,载《博览群书》,2007(5);赵晓军、褚卫红:《洛阳新出大秦景教石经幢校勘》,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07(3);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上册,522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张亚武:《景教经幢洛阳出土“丝路起点”再添力证》,载《洛阳日报》,2008年3月1日第1版;林悟殊、殷小平:《经幢版〈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考释》,载《中华文史论丛》,2008(1);殷小平、林悟殊:《〈幢记〉若干问题考释》,载《中华文史论丛》,2008(2);林悟殊:《经幢版“三位一体”考释》,载《中华文史论丛》,2009(1);林悟殊:《唐代景僧名字的华化轨迹》,载《中华文史论丛》,2009(2);徐晓鸿:《洛阳景教经幢的发现与初探》,载《金陵神学志》,2009(3);张乃翥:《洛阳景教经幢与唐东都“感德乡”的胡人聚落》,载《中原文物》,2009(2);葛承雍:《西安、洛阳唐两京出土景教石刻比较研究》,载《文史哲》,2009(2),又载《新华文摘》,2009(11);唐莉:《洛阳新出土大秦景教经幢文初释及翻译》,收入葛承雍主编:《景教遗珍——洛阳新出唐代景教经幢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Li Tang,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Jingjiao* Inscription of Luoyang: Text Analysis, Commentary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Dietmar W. Winkler & Li Tang ed., *Hidden Treasures and the Intercultural Encounters: Studies on the East Syria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Münster: Lit Verlag, 2009; Matteo Nicolini-Zani, “The Tang Christian Pillar from Luoyang and its *Jingjiao* Inscription: A Preliminary Study”, *Monumenta Serica*, Vol. 57, No. 1, 2009; 林悟殊:《中古夷教华化丛考》,168~258页,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1;Li Tang & Dietmar W. Winkler ed., *From the Oxus River to the Chinese Shores: Studies on East Syriac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Salzburg: Lit Verlag, 2012; 谭红艳:《唐代洛阳景教经幢再考察》,载《国学学刊》,2012(4);吴昶兴编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景教文献释义》,137~172页,新北,橄榄出版有限公司,2015;吴昶兴、陈继贤:《大秦景教石刻史料研究与再发现》,载《中台神学论集》,第6期,196~197页,2015。

代景教瘞穴，此种早期景教遗存在尚属国内首次发现，也是目前所知国内最早景教墓葬遗迹。^①又比如2010年洛阳出土花献墓志，2014年被学界认定与唐代景教有关。^②上述这些文物之重见天日大大补充了中国早期基督宗教史料，对于推动唐代景教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学界日益重视学术规范、学术研究史之今天，本书也依通例，就唐代敦煌汉文景教写经研究史进行述评。有关唐代景教研究史，耿昇、林悟殊曾就“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近四百年研究史作了综述，^③林悟殊、比利时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意大利马

① 焦建辉：《龙门石窟发现的景教遗迹及相关问题》，载《文物世界》，2013（6），38～39页；焦建辉：《龙门石窟红石沟唐代景教遗迹调查及相关问题探讨》，收入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4辑，17～22页，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张乃翥、郑瑶峰：《文化人类学视域下伊洛河沿岸的唐代胡人部落——以龙门石窟新发现的景教瘞窟为缘起（上）》，收入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石窟专业委员会、龙门石窟研究院编：《石窟寺研究》，第5辑，154～174页，2014。

② 郭茂育、赵水森等编著：《洛阳出土鸳鸯志辑录》，211～214页，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毛阳光、余扶危主编：《洛阳流散唐代墓志汇编》，下册，534～535、546～547页，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毛阳光：《洛阳新出土唐代景教徒花献及其妻安氏墓志初探》，载《西域研究》，2014（2），85～91页；吴昶兴：《真常之道：唐代基督教历史与文献研究》，247～266页，新北，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15；吴昶兴编注：《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大秦景教文献释义》，217～236页；吴昶兴、陈继贤：《大秦景教石刻史料研究与再发现》，载《中台神学论集》，第6期，198～207页，2015。

③ 耿昇：《外国学者对于西安府大秦景教碑的研究》，载《世界宗教研究》，1999（1），56～64页；耿昇：《中外学者对大秦景教碑的研究综述》，收入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中西初识》，167～200页，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耿昇：《中外学者对大秦景教碑的早期研究综述》，收入曹中建主编：《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9—2000）》，363～393页，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林悟殊：《西安景教碑研究述评》，收入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4辑，239～2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585～59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林悟殊：《唐代景教再研究》，3～2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